

A Dirge of Women under Cultural Shack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Plights i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Lijie An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Furong College,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by Afghan-American author Khaled Hosseini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Chinese author Xiao Hong as its subjects. Employing the method of parallel stud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bined with postcolonial feminist theorie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survival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in Afghan and Chinese rural societies. Although the two works are separated by time and space, the core of their female tragedies is rooted in profound patriarchal cultures. However, due to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ir oppression mechanisms present distinct forms of “explicit violence” and “implicit devouring”. The plight of Afghan women stems from the “tangible oppressors” under the interplay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war, while the tragedy of the women in *Hulan River* originates from the “nameless killing cohort” constituted by Chinese feudal rural rituals and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rough this comparison,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female destini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and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cross-cultural feminist studies.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Tales of Hulan River*; Female Plight;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枷锁下的女性悲歌：《灿烂千阳》与《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困境比较研究

安丽杰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中国·湖南常德 415000

摘要

本文以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灿烂千阳》与中国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结合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深入剖析阿富汗与中国乡土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尽管两部作品时空远隔，但其女性悲剧的核心均根植于深厚的父权文化。然而，因两国文化基因的根本性差异，其压迫机制呈现出“显性暴力”与“隐性吃人”的迥异形态。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源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战争交织下的“有形的压迫者”，而呼兰河女性的悲剧则来自中国封建乡土礼教与集体无意识构成的“无主名的杀人团”。通过这一对比，本文旨在揭示不同文化语境下女性命运的复杂性，并为跨文化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比较文学；《灿烂千阳》；《呼兰河传》；女性困境；文化差异

1 引言

全球女性主义思潮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一个核心议题：即普遍理论主张与地方性文化经验之间的张力。文学作为观察一个文化如何建构性别角色与关系的重要镜像，其价值凸显无疑。目前，学者对《灿烂千阳》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主义、创伤叙事与战争书写，聚焦于其显性的性别压迫与个体抗争；对《呼兰河传》的探讨则长期集中于

乡土批判、国民性反思及萧红独特的散文化叙事美学，剖析其隐性的文化吞噬机制。然而，很少有学者将《灿烂千阳》和《呼兰河传》进行比较研究。这种割裂使得两个文本所蕴含的、能够相互映照的关于性别、苦难、传统的深刻议题被孤立在各自的文化和学术“回音壁”内。

本论文创新性地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在社会性别理论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沿着困境的表现形式、文化根源和女性的反抗模式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展开对比，力图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既不放弃女性解放的普遍关怀，又充分尊重并深入探究了两种困境赖以产生的、各自独立的文化逻辑。

【作者简介】安丽杰（1983-），女，中国湖南常德人，硕士，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2 “显性暴力”与“隐性吃人”：两种差异化的压迫机制

在父权制的宏观框架下，《灿烂千阳》与《呼兰河传》分别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压迫形态。

2.1 压迫形式：制度化暴力 vs. 日常化“吃人”

在《灿烂千阳》中，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是外显的、制度化的，甚至是以法律和教令形式出现的暴力。这种压迫具有强烈的直接性与可见性。首先，身体暴力是家庭内部的常态。拉希德对玛丽雅姆和莱拉的毒打无需任何隐晦的理由，仅仅是作为丈夫“管教”妻子的自然权力^[1]。其次，这种暴力从私人领域扩展至公共领域，并被国家机器所合法化。塔利班政权颁布的一系列政令（禁止女性受教育、工作、不得无男性亲属陪同外出）系统性地剥夺了女性的基本人权与发展权。在这里，压迫是自上而下、有章可循的，是一种“看得见的铁拳”^[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呼兰河传》中内化的、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吃人”机制。这种压迫源于一套为整个乡土社会所默认并实践的习俗、礼教和“规矩”。它更为隐蔽，却也更为窒息。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她的“罪过”在于不符合传统对“媳妇”角色的期待——她“太大方”、“吃饭太多”，这些自然的天性被视为需要被“规矩”的异端^{[3][4]}。其婆婆与邻里施加的并非全是直接的肉体暴力，更多的是冷暴力、精神压迫以及以“为她好”为名的残酷规训。这里的压迫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它是一种“摸不着的空气”。

2.2 压迫者形象：有形的压迫者 vs. 无主名的杀人团

压迫形式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压迫者形象的迥异。在《灿烂千阳》中，压迫者是具体的、有形的。拉希德是父权与夫权的集中化身，他的暴戾、贪婪与控制欲是玛丽雅姆和莱拉苦难的直接来源。塔利班士兵则是宗教极端主义与政治暴力的符号，他们手持枪械，在街头公开执行其扭曲的教条，成为公共空间的恐怖象征。这些压迫者代表着一种“主动的恶”，其作恶意图明确，行为直接，责任主体清晰可辨。而在《呼兰河传》的世界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唯一的、具体的恶人。压迫的来源是鲁迅先生所精准概括的“无主名的杀人团”^[5]。婆婆、邻居、路人，乃至整个呼兰河城的男女老少，都是这个“杀人团”的一员。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压抑的、令人无法逃脱的文化场域。婆婆折磨小团圆媳妇，既有其自私与愚昧的一面，但她自身也是这套宗法礼教的受害者和被执法者。这是一种“被动的恶”，是一种由文化惰性和集体无意识所驱动的“平庸之恶”。无人需要为此承担主要罪责，因为每个人似乎都只是“规矩”的执法者，而非制定者，从而在无形中完成了对个体的吞噬。

2.3 核心意象：布卡与牢笼 vs. 大泥坑与热水澡

两部小说都运用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核心意象来凝练其压迫机制的本质。在《灿烂千阳》中，布卡物理性地遮蔽了

女性的身体与面容，象征着其社会身份的被抹除和主体性的被剥夺。紧闭的家门则将私人空间转化为内部监狱，与外部公共空间的剥夺里应外合，完成了对女性从内到外的全面禁锢。《呼兰河传》的核心意象则更具隐喻性和文化深度。大泥坑是呼兰河城的标志，它瘫痪交通，淹溺牲畜，甚至偶尔“吃人”，但居民们早已习以为常，从未想过要彻底填平它。它无疑是中国乡土社会停滞、污浊、封闭与吞噬性的完美隐喻，象征着那种让人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也无意识自救的文化环境。而给小团圆媳妇当众洗滚烫热水澡的仪式，则是“隐性吃人”机制的集中爆发和残酷典礼。滚水烫掉的是她的生命，而围观和参与则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的残忍^[6]。

综上所述，通过对压迫形式、压迫者形象和核心意象的对比：《灿烂千阳》中的阿富汗女性，身陷于一种由具体敌人、明确规则和物理暴力构成的“显性”罗网；而《呼兰河传》中的中国乡土女性，则窒息于一种由文化习惯、集体共谋和道德绞杀编织的“隐性”围城。

3 文化根源探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vs. 中国封建宗法礼教

《灿烂千阳》与《呼兰河传》中所呈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压迫机制，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深植于两国独特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土壤之中。

3.1 《灿烂千阳》：战争、宗教极端化与父权制的合谋

阿富汗女性的“显性困境”是其现代国家悲剧与复杂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首先，宗教的极端化解读与政治化利用是直接根源。其困境并非源于伊斯兰教本身，塔利班等极端组织摒弃了丰富的教法解释传统，将复杂的宗教教条简化为一套僵化、残酷且主要针对女性的禁令，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法律。宗教由此从个人的信仰转变为实施政治控制和性别压迫的强制性暴力工具。穿布卡、禁止受教育等规定，成为区分“虔信者”与“异教徒”的政治标识，女性身体成为极端意识形态角逐的战场^[7]。其次，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与动荡为这种极端化提供了催化剂和土壤。在持续的暴力与混乱中，传统的父权制观念被极大地强化。动荡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进而退守至最保守的文化身份认同中，而对女性身体的严格控制则被扭曲地视为维护文化纯洁性与家族荣誉的最后堡垒。

3.2 《呼兰河传》：宗法制度与“差序格局”的窒息性

呼兰河女性的“隐性困境”，其根源则深埋于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中，是一种文化基因式的内在痼疾。其一，是封建宗法礼教的深层遗毒。呼兰河城是传统中国的微观缩影，其社会核心是以父子为主轴、强调等级与服从的宗法制度。在这一体系下，女性从出生起便被定义为“他者”，其生命价值被严格框定在伦理秩序中，主要功

能是劳动力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小团圆媳妇作为“童养媳”，正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产物，她的悲剧在于其“人”的属性被完全抹杀，只剩下“媳妇”这一功能性符号。

其二，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8]是理解这种“无主名”压迫的关键。在这一格局中，“家族面子”和“他人看法”构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核心道德律令，其重要性往往凌驾于个体的生命权与幸福权之上。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之所以残忍地“规矩”她，深层动机是为了维护家庭在差序格局网络中的“面子”。

综上所述，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源于外部冲击（战争），导致内部文化（宗教、习惯法）的极端化与暴力化，从而生成一种“显性”的压迫机制；而中国乡土女性的困境则源于内部漫长历史所形成的宗法伦理与文化惰性，它是一种“隐性”的、通过日常习俗和集体无意识来实现的自我循环和复制。

4 微光与绝响：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反抗与同盟

女性对压迫的回应方式，是衡量一种压迫机制性质的终极标尺，也最为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的深层结构。

4.1 《灿烂千阳》：暴烈的自我救赎与“姐妹情谊”

在一种以“显性暴力”为特征的压迫环境中，反抗也相应地趋于外显化、激烈化和戏剧化。玛丽雅姆的人生轨迹呈现了一个从内部崩溃到外部爆发的完整过程。她前期对拉希德的顺从，是对自身私生女低贱身份的认同与内化，是父权制下女性自我价值感被彻底剥夺的体现。然而，当拉希德的暴力直接威胁到莱拉及其孩子的生命时，玛丽雅姆的母性本能与长期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发生了核爆般的觉醒。她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完成了对父权象征的弑杀，并为莱拉开辟了通往自由的道路。

小说构建了坚实的女性同盟。玛丽雅姆与莱拉的关系演变是叙事的核心动力之一。她们从共享一夫的情敌，到在共同虐待下滋生出相依为命的母女之情，最终升华为生死与共的政治盟友。她们的“姐妹情谊”超越了情感慰藉，成为了在男性暴力面前维系生存、策划逃亡、并进行最终反抗的战略性联盟。这一同盟关系是对阿富汗社会女性被隔离、被原子化处境的最有力反击。它证明，女性之间的联结与互助是抵抗压迫、保存人性光辉的最重要力量。

4.2 《呼兰河传》：无声的消亡与启蒙者的凝视

在一种“隐性吃人”的文化机制中，公开的、有形的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压迫者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因此，女性的回应更多地表现为消极的承受、无声的消亡与个体微弱的坚持。小团圆媳妇的“病”和死亡，是一种消极

的牺牲，其唯一的意义在于，通过萧红的书写，将其悲剧转化为对吃人礼教的血泪控诉和无情暴露。王大姑娘的反抗同样微弱，她以行动追求爱情，但其后果是被整个社会的舆论唾沫所淹没。

在这种文化中，压迫的执行者往往是女性自身。婆婆、杨老太太以及周围的女性看客，她们不仅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更是其最坚定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宗法礼教通过一套复杂的伦理规则，成功地将女性内部分化，并使其内化了压迫者的逻辑，从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抗争阵线。

唯一的微光来自叙事者“我”——童年萧红的旁观与凝视。这种凝视充满了孩童的困惑、同情与不解，它是一种尚未被世俗规则完全污染的、相对纯净的视角。然而，这种凝视本质上是疏离的、无力的。萧红以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既深刻揭示了悲剧的普遍性，也坦诚了个人在庞大文化惯性面前的孤独与无力感。

5 结论与启示

《灿烂千阳》与《呼兰河传》展现了父权制压迫下女性困境的两种经典范式。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是硬性的、政治性的，源于可见的压迫者与制度化的暴力；而中国乡土女性的困境是软性的、文化性的，源于无形的文化习惯、宗法礼教与集体无意识。虽然时代背景已变，但文化基因具有强大的惯性。理解《灿烂千阳》中极端主义与性别压迫的共生关系，则为我们洞察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地域冲突、宗教政治化以及性别权利倒退现象提供了关键的视角。理解《呼兰河传》中的“无主名的杀人团”，有助于我们审视当代社会的网络暴力、道德绑架和群体性冷漠——这些现象不过是“看客”心理与舆论杀人的现代数字化变体。而这两部作品的并置研究，最终旨向的是对一切形式压迫的警惕与批判，以及对人类普遍自由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

- [1] 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尚必武,刘爱萍.卡勒德·胡赛尼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2007,(05):9-11.
- [3] 萧红.《呼兰河传》.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 [4] 张英鸣.《呼兰河传》的生命悲剧意识[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6):82-84.
- [5]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 古斯塔夫·庞勒.《乌合之众》.海蜃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7.
- [7] 李青霜.绝望中的希望拯救生命的力量——评胡赛尼的《灿烂千阳》[J].外国文学,2012,(06):65-71+158.
- [8] 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